

# 金融危机和能源价格双重冲击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

## 卷首语

金融危机多发和能源价格飙升可以看作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特征，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它们的出现揭示出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层次弊端，彰显出了改革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源自各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但是已经开始敲问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就根据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结果预测得出东亚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推动，在长期不可持续的结论。由次级贷危机引发的 2008 年金融危机至今并未消散，而且经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人们的最深刻教训就是过度杠杆化虚拟经济的潜在风险，再次凸显实体经济在一国经济中的基石作用。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把经济刺激投资主要用于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开发，试图探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来转变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模式，打造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经济增长的“岩上之屋”。可见，金融危机已经让世界各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面前别无选择。

显然，新能源和低碳绿色技术的开发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这是一个战略转折点，谁占据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谁就将主导未来全球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使得易开采能源存量大幅度减少，再加之各种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促使能源价格多次出现飙升。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无论是中东石油危机还是海湾危机，每次由油价上涨所引发的石油危机几乎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因此，只要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这种能源价格上涨和经济增长下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短期内就难以改变，因此，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传统能源的消费比重，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中的新能源因素，将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能源和环境又是两个紧密相联的问题，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过度开发和滥用造成了各种各样严重的环境污染，极大地恶化了我们的生活环境，这也倒逼我们改变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方式和进一步开发各种清洁的新能源。特别是环境污染中的二氧化碳被很多科学家认为是导致气候异常变化的罪魁祸首，赋予其强制减排合理性，并被一些国家利用来作为延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政治斗争工具，低碳发展似乎正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在肆略的金融海啸中，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多

方面的。欧美市场的经济衰退使得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进出口马车失去了强劲的拉动力，这进一步突出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不合理，比如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远低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能源密集型的机电和化工产品出口份额增长过快等。2008 年底应对金融危机的 4 万亿人民币总刺激投资虽然对避免经济衰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政府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后患无穷，其后果之一就是地价房价的畸速飙升，其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增速放缓本身，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也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除了投资驱动，能源驱动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重化工业现象再次出现，能源消耗和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达至极致，目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耗国和碳排放国，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国际上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带来的国际压力也使得能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可以说，和世界主要国家一样，金融和能源危机也使中国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革新观念和改革旧有的增长模式惯性已经成为中国未来 10 年甚至 5 年内的首要选择，对于以经济持续增长赋予治理合法性的中国来说，这种改革以及相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说比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都要来得更为紧迫。

其实，金融危机和能源短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折射出的是中国要素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相对于产品市场，中国要素市场呈现典型的垄断特征，市场经济力量尤其羸弱。欧美金融危机的过错并不在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本身，金融自由自然会孕育金融风险，欧美危机的根源正在于金融监管的缺失。而中国则是相反的问题，身处金融市场发展的中前期，金融自由以及与之俱来的金融创新在现在这个时期远比监管更为重要，这才是金融市场发展壮大生命力所在。中国的石油化工和电力市场一直处于垄断经营状态，连 1994 年率先放开双轨制价格率先成为竞争市场的煤炭市场也于 2009 年经由煤炭企业重组回归垄断状态。当然，在当今中国，更为紧迫的改革远不止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在书中中国经济增长部分，陆丁教授估算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扩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土地对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劳动要素和索罗残差，其边际产出也比资本投入增长更快。陈杰等则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保罗、陈钊和陆铭教授则分解出收入不平等的各种影响因素，发现工资报酬仍然是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其次才是养老金和财产收入等。文贯中教授则认为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当务之急，通过加快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实现充分就业来解决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不公平。

可以说，从 2005 年开始，每年一度的“上海论坛”就瞄准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和世界经济问题从区域经济、全球化、城市化、金融、能源等不同的视角展开

讨论，来自于国内外的经济学者济济一堂，碰撞观点，激发灵感，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凝练出大量真知灼见，可谓硕果累累。从历年上海论坛所演讲的经济类论文中，我们精挑细选了二十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报告收录进该经济类丛书，以飨读者。本丛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在中国经济增长部分，除了上述提及的论文外，还收录了三篇论文。张曙光教授在 2008 年 5 月份召开的上海论坛上已经预见中国内外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大，一旦国际经济出现衰退，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当年底次级贷危机发生时可谓言犹在耳。杨瑞龙教授则指出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必须靠壮大市场力量而非政府主导来实现。学者 Knight 等则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不平衡。中国与世界经济部分共收录了 7 篇论文，其中，裴长洪教授基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走向和中国土地、资源、环境约束分析了“十一五”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姚洋教授分析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历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出现可谓这一轮全球化的耀眼明星。华民教授认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国内外经济失衡问题，应当推进贸易自由化。俞肇熊教授提出以大中华区域为平台，促进香港与内地和台湾的经贸合作互补互助来协调亚太地区的竞争和共同发展。张幼文研究员和 Kim 以及 Mo 等学者则讨论了中国和国际合作的包容性发展概念、资本流入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及 G20 的全球治理职能等主题。

在书中金融危机和金融改革部分，Greenaway 教授纵论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亚洲国家复兴的重要性。樊纲教授等针对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风险建议亚洲各国互相持有对方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以降低亚洲各国外汇储备风险。巴曙松研究员等认为应从利率基准、利率定价和利率结构三个角度观察当前中国的利率政策。胡汝银研究员针对证券市场安全问题，认为政府政策重点必须转向建立合理的证券市场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等基本制度安排。陈学彬教授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学者 Liu 和 Griswold 则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和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货币和美国经济的相关问题。在书中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部分，Jim Skea 教授讨论了能源部门和气候变化中的政府和市场职能主题。张中祥研究员讨论了美国和中国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约束性指标以及美国有可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的问题。史丹研究员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效率的变化、能源强度变化的结构因素以及经济增长中的过度能耗问题。齐绍洲教授等发现贸易开放增加了中国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是负面的，向底线赛跑效应大于贸易的环境收益效应。徐海燕博士分析了原油价格暴涨与国际原油价格体系的变迁。学

者 Ahn 和 Sanwal 则分别讨论了韩国的低碳绿色增长策略以及低碳经济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书只是收录了历年上海论坛所报告经济类论文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备选论文目录客观上的不齐全和我们的水平所限，还有很多重要论文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原谅。即使对所收录论文，上述评价也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也请作者和读者多多批评。期待本丛书能够为读者理解快速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有益的导读和有价值的线索！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2012年3月